

|| 中国边疆民族考古文库 ||

前吐蕃 与吐蕃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编

文物出版社

中国边疆民族考古文库

前吐蕃与吐蕃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编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陈 杰
责任编辑:陈 峰
责任校对:赵 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吐蕃与吐蕃时代 /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11

(中国边疆民族考古文库)

ISBN 978-7-5010-3817-6

I. ①前… II. ①中… III. ①吐蕃—民族历史—文集
②青藏高原—考古发现—文集 IV. ①K289—53
②K87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9687 号

前吐蕃与吐蕃时代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邮 箱: E-mail: web@wenwu.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0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3817-6

定 价: 148.00 元

中国边疆民族考古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 编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李裕群

副主编

刘国祥 巫新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仁湘 王 鹏

仝 涛 刘国祥

李裕群 巫新华

赵慧民 郭 物

桑 栎 黄 珊

本卷主编

李裕群 仝 涛

前 言

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后期，主要是一些西方人在探险和考察活动中对零星的地面文物进行搜集和记录。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正式的考古工作才得以展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一大批内容丰富的古文化遗存展现在世人面前，西藏的考古事业迎来了的繁荣期。到目前为止，西藏境内发现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岩画等遗迹已经超过 2000 处，其中一系列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成果，已经深深刻写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使西藏文明演进的轨迹渐趋清晰。此前主要的工作成就包括：旧石器和细石器采集点的持续发现（1956 ~ 1976 年），昌都卡若遗址发掘（1978 ~ 1979 年），吐蕃时期墓葬的调查和发掘（1982 ~ 1993 年），拉萨曲贡遗址发掘（1990 ~ 1992 年），吐蕃王陵勘测（2000 年），青藏铁路西藏段考古调查（2003 年），阿里象泉河上游考古调查（2004 年），西藏第三次文物普查（2007 ~ 2010 年）等。

本文集收录研究论文二十余篇，回顾了近几十年以来在西藏考古领域内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在时段上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吐蕃时期的各个阶段。吐蕃时期以后的资料，由于大多涉及藏传佛教文化，文献记载较为丰富，宗教史和艺术史研究领域的论著较多，所以暂不列入。在地域上，本文集以西藏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为主，由于青海地区在吐蕃时期成为吐蕃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藏族的形成及藏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关青海地区吐蕃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论文也收录其中。

西藏的史前文化是最早展开考古学研究的领域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初，由于旧石器和新石器地点的大量发现，启发学者们思考高寒荒原上最早居住者的来源问题。童恩正和贾兰坡根据青藏高原古环境变迁以及周边的古猿化石的发现情况，推测包括青藏高原的中国西南地区可能是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这一假说对于西藏旧石器时代的研究是一个大胆的创新，同时也对后来的青藏高原史前研

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全新研究手段的应用，如同中国境内其他地区所出现的相关纷争一样，这一推断也遇到了新的挑战。石硕援引了分子生物学领域关于人类起源和迁徙路线方面的研究成果，对青藏高原人类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也对于青藏高原旧石器与华北地区的关联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汤惠生通过对考古和人类学资料的分析，认为在全新世以前青藏高原尚无人居住，现在应该纠正这种“错误提法”。

早在20世纪80年代，童恩正就敏锐地觉察到手斧是考察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外部联系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并认为西藏东部的手斧可能是受了印度北部手斧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一推断得到一些学者的响应和新出考古材料的支持。虽然有的学者对这两件手斧的界定有所质疑，但这一问题的提出无疑开启了对于西藏地区旧石器来源复杂性研究的大门。吕红亮根据西藏西部夏达错新近发现的手斧，联系南亚次大陆的相关材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指出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拥有阿舍利工业的早期人类可能已经从南亚次大陆发展到西藏西部一带，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童恩正的论断。

近几十年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最为重要的收获当属卡若遗址和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它们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同时也分别为藏东和藏南的新石器时代树立了标尺。王仁湘和石应平分别就这两个遗址的文化面貌、性质与年代、经济形态及精神生活诸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深化了对西藏史前文化的认识。

青藏高原的细石器遗存自20世纪50年代在藏北首次发现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关于这些细石器的来源，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华北起源说”，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本土起源说”也受到了关注。李永宪的研究认为西藏细石器工业也有可能源自本土的石片石器传统，本地形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汤惠生则将青藏高原细石器划分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区域类型，认为其有不同的渊源关系，藏北地区与华北细石器有直接的渊源，而藏南细石器传统更接近华南尤其是西南地区，特别与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石器传统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20世纪80年代，童恩正提出了对西藏考古学文化分期的设想，将西藏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石器时代、早期金属器时代和吐蕃时代。这一分期现在看来显得粗略，然而对于当时的西藏考古实践来说，确实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尤其是对于“早期金属器时代”的概括和应用，具有很高的科学意义和实事求是精神。

青藏高原自石器时代结束到吐蕃王朝兴起，有长达近两千年的间隔，不仅文献记载阙如，通过考古发掘获取的资料也相当零散和模糊，鲜有确切的断代，无法对考古学文化面貌形成整体的、系统的认知，因此这一“模糊处理”便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而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学资料的充实和科技考古手段的进步和完善，作为权宜之计的“模糊处理”到了需要重新审视和矫正的时候。目前对于该时段的考古研究对象来看，主要包括早期金属制品，藏北、藏西的大石遗迹、岩画、墓葬、城址，西藏东部的石棺葬文化等，其中西部和北部的遗迹基本上与古代象雄文明相对应。这一时期西藏地区已经发展出比较发达的文明中心，形成了部落联盟性质的游牧国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宗教、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和技术渊源。同时其与外部的联系也更为密切，西部与克什米尔和中亚，北部与欧亚草原，南部与南亚次大陆，东部与川滇地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传播通道，广泛的沟通和交流为后来的吐蕃文明奠定了一定基础。本文集中所收集的有关曲贡带柄铜镜、日土岩画、藏西陶器制作技术、立石遗迹、藏东石棺葬以及有关象雄文明的探讨，基本上反映了最近几十年来针对这一时段考古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吐蕃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墓葬及其出土物，因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能确定为吐蕃时期的居址或城址，而吐蕃时期的墓葬则规模大，分布地域广，出土物丰富，因此成为近几十年来吐蕃考古的焦点，也是取得成果最多的方面。研究较为深入的主要是几处大型墓地，包括琼结藏王陵、朗县列山墓地和青海都兰热水墓地，针对这些墓葬的形制布局、丧葬制度、宗教习俗等进行分析，并结合文献对墓地主人身份进行推测。这些墓葬所代表的吐蕃文化的类型，多与当时吐蕃王国所吞并的属国相对应，在丧葬制度的高度统一性之下兼具一些地域特点。其中青海吐蕃墓地的出土物比较集中，尤以都兰和德令哈两地最为丰富，因此形成一系列专题性研究成果，包括霍巍关于吐蕃系统金银器、许新国和赵丰关于都兰丝织品、罗世平关于郭里木棺板画的讨论等，从不同侧面考察了吐蕃时期的物质文化生活面貌。有关吐蕃对外交流的考古材料也尤其受到关注，如《大唐天竺使出铭》石刻、拉萨大昭寺银瓶、都兰发现的丝绸及金银器等。通过对这些发现的解读，可以了解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与中原汉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交通路线和文化交流状况。

从本文集所收录的这些论文，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数十年来西藏考古新发现所带来的研究领域新进展，同时也可以窥见学科发展的总体轨迹和趋势。从所及地域来看，随着考古新发现的激增，研究对象从局部地区（如藏东地区）扩展到西藏全

境，并覆盖了周边相关地域（如青海、川滇西北、北印度等）。事实上，青藏高原虽然地理环境独特，文化发展轨迹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考古学者的学术视野从一开始就没有仅仅局限于青藏高原内部，而是将之置于欧亚大陆更广阔的空间中进行讨论。从研究方法上看，从起初的概述、推测性质的研究，逐渐出现系统性、专题性的深入分析，各家对所提主张更为自信，所举证据也更加充分和有说服力。同时我们也看到，西藏考古的专业队伍在不断壮大，从之前的少数精英学者发展成目前相对完整的研究梯队，并逐渐形成为汉、藏考古学者通力合作的局面。

在本文集的形成过程中，编者也不免心存遗憾，其一是，有关西藏考古的研究论文数量并不丰富，这主要是因为西藏考古的从业人员和工作成果，在最近十年来并没有得到充足的发展，这与西藏广袤的疆域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并不相符。其二是，长期以来西藏的考古工作以配合基建为主，主动性的发掘并不多，一些重要的线索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样就很难有步骤地建立和完善西藏考古的年代学框架体系，也为未来的西藏田野考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方向。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年代学缺环包括：旧石器—新石器的过渡，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序列，新石器时代—吐蕃时期的缺环（即早期金属器时代），吐蕃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其三是，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综合性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还没有有效实施，目前所进行的工作还局限在传统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内，这也是未来的西藏考古发掘必须同步跟进的一个方面。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在未来的数年间，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藏学研究中心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内的数家科研机构，将在西藏全境展开大规模的主动性田野考古工作。这必将会产生一系列学术意义重大的考古发现，无疑会对此前的研究成果形成一定的冲击，并且促进研究方法体系的更新，使西藏考古学科取得更为骄人的成绩。

让我们翘首以待！

编者

二〇一二年九月

目 录

1 / 西藏考古工作 40 年	夏格旺堆 普智
19 / 人类可能的发源地——中国的西南地区	童恩正
33 / 从人类起源的新观点看西藏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石 硕
42 / 西藏高原上的手斧	童恩正
48 / 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再认识 ——以阿里日土县夏达错东北岸地点为中心	吕红亮
60 / 卡若遗存若干问题的研究	石应平
73 / 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	王仁湘
85 / 略论西藏的细石器遗存	李永宪
93 / 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	汤惠生
107 / 藏族体质人类学特征及其种族源	韩康信 张 君
119 / 西藏高原古代墓葬的初步研究	霍 巍
138 / 日土岩画的初步研究	张建林
144 / 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有关问题	赵慧民
154 / 西喜马拉雅地区立石遗迹初论	吕红亮
168 / 西藏西部陶器制作工艺的观察和初步研究	姚 军
186 / 论古代象雄与象雄文明	霍 巍

200 / 西南地区的石棺墓分期研究	
——关于“石棺葬文化”的新认识	陈祖军
242 / 近年来西藏境内吐蕃时期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	
——兼论“吐蕃属文化”	侯石柱
253 / 西藏琼结吐蕃王陵的勘测与研究	王仁湘 赵慧民 刘建国 郭幼安
285 / 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	许新国
296 / 青海都兰热水一号大墓的形制、年代及墓主人身份探讨	全 涛
324 / 试解列山古墓葬群历史之谜	巴桑旺堆
337 / 天堂喜宴	
——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笈证	罗世平
355 / 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	霍 巍
405 / 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	许新国 赵 丰
428 / 吐蕃王朝前后的西藏建筑	屠舜耕
442 / 西藏发现的两件有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	宿 白
446 / 《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	霍 巍
·	
462 / 前吐蕃与吐蕃时代考古文献目录索引	
470 / 编后记	

西藏考古工作 40 年*

夏格旺堆 普智

1959 年之前，西藏没有文物管理机构，考古工作的开展主要由一些西方学者进行，并且仅限于地面遗存的调查和观察记录。1959 年西藏平息叛乱不久，成立了“中共西藏工委文物古迹、文件档案管理委员会”，下设文物管理小组，这是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前身，也是西藏最早的文物管理机构。1964 年，在西藏工委文物管理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组。1965 年 9 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不久，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且制定了“集中起来，保管好”的文物工作方针^[1]。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解放初期开展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 1965 年成立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一机构一直担负着安排全区文物考古的行政管理和业务工作的重要角色。由于新时代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1995 年对原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调整、充实后，成立了西藏文物局，直属单位有布达拉宫管理处、西藏博物馆、西藏罗布林卡管理处及西藏文物商店。目前，西藏五地区一市都成立有文物管理机构，并且在札达县等文物古迹数量较多和工作开展较好的县里，也成立有相应的管理部门。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西藏考古工作者从内地各大专院校毕业，充实到西藏考古队伍以来，国家投资委托内地专业院校，举办了大专以上学历的西藏文博班 2 个，专门为西藏培养了 60 多名专业人才。除此而外，从内地专业院校毕业的汉族和藏族专业人员，也先后投入到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队伍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西藏文物考古队伍中的骨干。

20 世纪 50 年代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半个世纪、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通过综合与专题结合的考古调查，在西藏境内发现了内容丰富、种类齐全的古文明遗存。这些发现，不但对研究西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特殊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人类文明及其人地关系等具有世界性学术研究价值的重大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到目前，西藏境内发现的包括古遗

* 选自《中国藏学》2005 年 3 期。

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及岩画、近现代重要史迹等各类文物点已经超过 2000 处。值此西藏自治区成立 40 周年之际，简要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西藏考古工作的主要成果，以此致贺并祝愿西藏文物考古工作在新时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一 石器时代

1956 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先生在藏北那曲采集到了一件细石核。这不仅是在西藏境内首次发现的细石器^[2]，而且对认识西藏高原的石器时代文明具有破天荒的重大学术意义，它开了西藏史前文明科学研究的先河。随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那曲和藏西阿里等区域内，相继发现了 5 个旧石器地点和几十个细石器的采集点。20 世纪 70 年代，继在西藏西北部发现旧石器和细石器后，在藏东南和藏东又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到了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陶片等。这些遗存的发现，首先改变了西藏石器时代文化的保存状态，即由原来仅从地面采集转为具有明确的层位关系；其次，更加丰富了遗存的种类、内涵，逐渐呈现出西藏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性特征和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再次，不但在空间分布上有所扩展，而且在研究的科学性上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提高，为了解和研究西藏石器时代的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状况，提供广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发现更有科学依据的实物资料。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全区文物普查的开展，在西藏境内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存地点更是数以百计，几乎遍及全区。不仅地面采集地点的分布得到空前的拓展，具有地层依据的石器遗存也开始多了起来，而且对了解石器时代区域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及其流变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依据，把西藏考古工作与研究推向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新的发展阶段。

（一）旧石器时代

目前，西藏境内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有 8 处，分别为藏南定日的苏热^[3]，藏北申扎的珠洛勒^[4]和多格则^[5]，藏北班戈色林错东南岸的各听^[6]，藏西日土的扎布^[7]和夏达错东北岸^[8]，藏南吉隆的哈东淌和却得淌^[9]。在上述 8 个地点中，后 3 个地点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西藏文物普查中发现，其余都为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初期由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综合科学考察中发现。由于对这些被发现的旧石器的特征描述、类型划分等方面的内容，已经在前引各文本中都有详尽的介绍，在此不作过多的重复。

关于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年代问题，目前仍然在讨论当中。由于此期石器缺乏明确的层位关系，即便通过石器类型的比较和采集点所处环境的地质地貌特征等来进行分析断代，认为西藏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年代至少应在距今 5 万年，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10]，但这种断代方法均属间接断代法，难免存在着诸多质疑的地方^[11]。所以有学者提出，“青藏高原所发现的旧石器，无论石料选择、器物的形制和大小，以及加工技术

等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细石器特征。由此看来，青藏高原的旧石器从类型学上也许可以划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范围，但其绝对年代是否在 1 万年以前，尚需今后进一步的科学测定”^[12]。以上这两种观点的提出，显然是各有各的依据，但我们通过比较后认识到，要想真正解决西藏旧石器时代的年代学问题，还需要发现和发掘具有明确层位关系的文化遗存。而要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不仅仅局限于发现一两座具有层位关系的遗址，它们还应当能够反映出石器工艺传统和内涵在区域文化中的形成和传承的尽可能全面的特征。

除此而外，石器工艺传统与渊源是包括细石器在内的西藏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另一令人关注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许多研究者将西藏旧石器的工艺传统和渊源都与我国华北旧石器系统联系在一起^[13]，认为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不仅可能与我国华北、西南及东南亚旧石器文化发生过交流，而且与喜马拉雅南侧旧石器文化的发生交流在这一时期也是完全可能的^[14]。与上述看法不同的观点认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明显呈现出细石器特征，可能在旧石器时代或全新世以前，青藏高原尚无人居住，尤其在其腹地的西藏境内。自全新世以后，很可能是分别来自华北和华南的两支移民进入青藏高原，并带来了与之相应的藏北和藏南两个不同传统和类型的细小石器和细石器工艺，而青藏高原与北方草原和南亚诸地的交通和文化往来，恐怕至少是卡若和曲贡文化以后的事了^[15]。

不难看出，西藏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的判定，石器工艺传统及其渊源的研究，石器年代的测定等问题，不仅成了研究西藏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方面的内容，而且同样关系着石器时代的人类是如何形成、开发和创造了最初文明于这片高天厚土上的问题。尽管目前我们仍很难回答上述问题，但客观上讲，正因为有了这些问题，所以才不断地推动着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前进的车轮。

（二）新石器时代

由于西藏境内发现的具有层位关系、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址都是晚期的遗存，所以西藏的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交替是如何产生的，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而言，学者们将发现于藏西北（即藏族传统地理划分中的“羌塘”和“堆”）的不见陶器、骨器、金属器及大型打制石器，而以细石器及小型石片工具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大致认为是代表西藏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文化，并冠以“藏西北文化类型”，其时代大约距今 7500~5000 年，经济类型以狩猎经济为主^[16]。自此之后的考古学年代的遗址有卡若（kha-rub）、曲贡（chu-gong）、小恩达（dngul-mdav）、邦嘎（bang-mkhar）、昌果沟（phreng-ngo）、达龙查（stag-lung-brag）^[17]等，另外有林芝县的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和拉萨纳金等地^[18]，以及墨脱县境内的 7 处采集点等^[19]。晚期遗址的年代大约距今 5000~3000 年。

除了这些具有地层依据的遗址外，高原上大量发现的细石器采集地点是西藏石器时代文化的又一显著的特点。截至1990年，在日喀则西部的昂仁、仲巴、萨嘎、吉隆、日喀则和山南贡嘎等地、县境内发现细石器采集地点30余处^[20]，这个数字比1989年统计的西藏高原发现细石器地点为40处^[21]将近增加了一倍。截至2005年，加上前面两个统计总数的70处，细石器地点已经达到102处，其中2000年全区文物补、复查中在藏北申扎县发现1处^[22]；2002年“藏北无人区综合科学考察”中发现6处^[23]；2003年“青藏铁路西藏段考古勘探项目”中发现18处^[24]；2004年“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项目”中发现4处^[25]；2004年配合西藏阿里地区地方志文物卷的编写而进行的阿里地区文物调查中发现3处^[26]，这些细石器点的发现，虽然很多尚未研究透彻，但给西藏石器时代的文化增加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在上述这些遗址中，对卡若、曲贡、邦嘎、昌果沟等做过相对较多的工作，由于这几座遗址是学术界较熟悉且有较多已刊布的介绍文章，所以在本文中除了对这些遗址开展过的新工作情况作必要的介绍外，选择一些大家不是很熟悉和新发现的遗址、石器时代文化地点作相应的介绍。

1. 西藏东部和东南部，主要为昌都和林芝 这一区域早先发现的遗址和新石器时代采集点有昌都地区的卡若、小恩达、烟多，林芝县的云星、居木、加马拉，墨脱县境内的7处采集点等。除此而外，近期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昌都江钦遗址。

林芝地区发现的云星、居木遗址，加拉马和拉萨纳金公社采集点都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基建过程中被推土机推出来的。由于纳金公社采集点在公社北侧的山坡上采集到了少量的夹砂褐陶和红陶片之外无其他遗存，所以其文化内涵并不清楚。以上遗址和采集点目前还没有开展科学的发掘工作^[27]，但从包括墨脱县境内当地群众开荒种地时捡到的石器及陶片来看，并不能忽视地方性文化的诸多特征。

1977~1979年对昌都卡若遗址进行的科学发掘，不但为西藏石器时代考古，而且在西藏史前文化的内涵、区域特征等方面首次提供了具有地层依据的实物资料。卡若遗址独具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学者们把文化内涵、特征等方面有相同点的小恩达等遗址一起命名为“卡若文化”。时隔23年之后，2002年10~11月，为制定“昌都卡若遗址保护规划”，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其目的在于确定遗址分布范围、重要遗迹区位置及遗址的保存现状。此次揭露面积为200多平方米，发掘中清理、发现各类遗迹21处，其中房屋遗址3座、灰坑16座、道路1处、水沟1条。出土各类遗物7000余件（片），其中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共1000多件；陶器残片1200多件（可复原3件）；骨料、骨块共4000多件；重要文物100余件。通过此次发掘证实，在原保护区西侧、东侧仍有原生文化堆积分布，其总面积应在1500平方米以上，遗址东部应保存有房屋遗址、灰坑、道路等重要遗迹，结合其他因素，原遗址的保护区面积约在2000平方米左右^[28]。

2000 年为了补充《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分册》和《西藏自治区文物志》的资料内容,西藏文物局组织四川大学、西藏博物馆和山南文物局等的专业人员对西藏“五地一市”开展的文物点的补、复查项目中,在澜沧江支流麦区河畔发现了察雅县江钦遗址。该遗址是藏东三江流域河谷地区继卡若、小恩达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大型史前遗址。有学者认为,在遗址采集的打制砍斫器、盘状器、夹砂陶器残片和地面残留的烧土建筑遗迹等,再次证明横断山脉的河谷地区不但是高原史前文明居民最为集中的文化区,而且是西藏山地农业起源最早的区域^[29]。

2. 西藏中部,主要为拉萨、山南和日喀则 目前在日喀则境内还未发现具有地层依据的石器时代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存绝大多数为地表采集点,尤其分布在日喀则西部各县为其主要特点。然而笔者以为,这并不应该是该区域史前文化的实际情况,也许可能与我们目前开展的工作侧重点以及力度相关。拉萨曲贡不但是西藏腹心地区的一处史前遗址,而且与昌都卡若一起、作为阐释西藏史前区域文化特征的典型遗存来认识。由于该文化遗存所反映出的区域性文化特征与山南的邦嘎、昌果沟遗址相近,所以将它们一起被看做是“西藏腹地一支具有代表性的晚期新石器文化”^[30],这一文化被命名为“曲贡文化”。

达龙查遗址是在 1990 年的文物普查中发现,位于堆龙德庆县乃琼乡达龙查寺西南约 1 公里的山脚下,地貌为洪积扇,遗址面积约 5000 平方米,当时主要对遗址中的两座平底窖穴做了试掘清理,出土石制品 20 余件,分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类。陶器残片可分夹砂陶和泥质陶,多见夹砂红陶,夹砂褐陶次之,另有夹砂和泥质的磨光黑陶。与上述遗物相伴的兽骨多属牛、羊、马等。“出土物的诸多因素与拉萨曲贡遗存十分相似,推测二者可能属于同一文化类型,时代也可能大致相当”^[31]。

邦嘎遗址位于山南地区琼结县下水乡境内,现存遗址面积约 3000 平方米,遗址呈条带状分布,东西长约 100 米,南北宽约 30 米,海拔 3900 米。1985 年 7 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普查队员在遗址南端靠近冲沟断崖处揭露总面积为 50 平方米,发现石框灰坑 4 个,灰坑形制为长方形和圆形两种,最大面积 0.5 平方米,最小面积 0.2 平方米,所有灰坑都用石料做边,且与坑壁平直,石料分卵石和片石,灰坑深度为 0.1 ~ 0.25 米,内均填有深灰色土,出土兽骨、木炭、陶片等。另外在遗址中出土磨石、石磨盘、重石、石球等石器数件。虽然没有出土完整器形的陶器,但出土了 200 多片陶片,同时有大量动物骨头的出土^[32]。2000 ~ 2002 年的 3 年里^[3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博物馆及山南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 3 次发掘。通过发掘,该遗址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一座半地穴式房屋、灰坑十几座、灶膛两座和较为晚期墓葬一座等,出土遗物有石器(以石磨盘和磨棒为主)、陶器和少量的骨器。房屋的发现,为西藏中部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其意义非常重大。房屋开口于早期地层第 4 层之下,平面形制为圆角近方形,面积 6 × 6 平方米,墙壁残高约 0.2 ~ 0.4 米。

屋内发现大小灰坑9座，这几座灰坑基本位于房屋的中部靠偏北，且直接打破了没有文化堆积的生土层。发现的石器中以磨盘和研磨器为主要特点，具有地方特色。少量陶器的特征，与拉萨曲贡、山南昌果沟等遗址出土的陶器属于同一种陶作工艺特征。

2003年6月，青藏铁路沿线的考古调查中，堆龙德庆县古荣乡境内的嘎冲村（dgav-grong）附近发现了一处上限可能早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晚到早期金属时期的古遗址。这处古遗址中发现少量的打制石器、夹细砂红陶片、黄褐陶、磨光黑皮陶及铁渣子等^[34]。2005年5月对该遗址进行的简单调查中，在距地表深度约1.5米处的断崖剖面暴露有夹砂红陶罐口沿、黑皮陶和褐红皮陶以及灰陶，少数陶片上还有刻划纹，另外在遗址的北面一坡地采集到了一件“涂红色”砾石砍器^[35]。从发现的这些遗物及遗址断面的石构遗迹，在遗址东北面的断面中发现的人骨及可能为其墓葬结构的石块等来看，该遗址的内涵当不会较为单一简单，从时间的延续性来看，也可能上限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晚至吐蕃早期。文化性质基本与以拉萨曲贡为代表的西藏腹地的邦嘎、昌果沟等遗址相近。

正如在前文中所述，通过全区文物普查，仅在1990年日喀则西部各县发现了近30处的细石器采集点。而在这之前的1966年和1976年，日喀则地区的聂拉木发现的采集点有2个^[36]、吉隆县1个^[37]。由于文物点的数量众多，在此不可能做更加详细的介绍。但这些石器采集点“对于继续深化对西藏高原细石器文化渊源、传承问题的认识，无疑会产生强烈的影响”^[38]。

3. 西藏西北部，主要为那曲和阿里 西藏西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采集点的最早发现，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的综合科学考察中。这段时间发现的采集点，已经有学者归类为“不见陶器、磨制石器，只见细石器和大型打制石器或单纯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地点”^[39]。主要有藏北黑河（那曲）的1个地点^[40]，藏北申扎、双湖的18个地点^[41]，其中的珠洛勒地点不但有旧石器，而且也是较为典型的细石器采集点；班戈县的才多茶卡、蒂让碧错、雅曲雅土、错尼地点^[42]；普兰县的马法木湖东北岸地点、日土县的帕也真沟地点^[43]。

自此之后的90年代的初期到中期，进入到了这一区域内发现石器采集点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得益于全区文物普查项目的开展，这一阶段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新发现了10处采集点^[44]，分打制石器和细石器采集点两类，较为典型的细石器采集点要少于打制石器采集点。而那曲地区，没有新地点的发现。

1994年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全面结束迄至目前，西藏文物考古的重心也开始移向区域性文化的调查、研究、保护等项工作中，结合这些项目的开展发现了一批新的石器采集点。这段时间发现的新的采集点总数也达近50处，可以被认为这一区域石器采集点的第三阶段。

2000年全区文物补、复查项目中，在申扎县境内发现了2处石器采集点：达卓与乃